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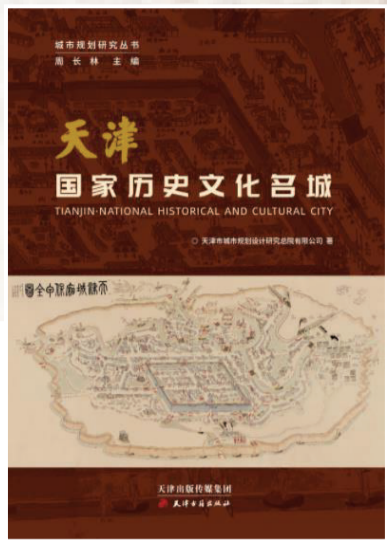
津报力荐

天津:北方的明珠

推荐理由:天津人文与自然景观风貌独特,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拥有众多珍贵的文物、历史风貌建筑以及保存完好、风貌独特的历史文化街区。独特的城市气质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使其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本书分为“别具一格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与特色”“筚路蓝缕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发展历程”“津沽瑰宝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资源”和“蝶变新生 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新实践”四章,既有对天津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的详细介绍,又有对天津在国家关怀下名城保护工作开展情况的分析,更有对天津光辉前景的展望。该书内容翔实、图文并茂,能让读者读后更加热爱天津。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城市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天津,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中西合璧、古今贯通的城市风貌,成为中国北方一颗耀眼的明珠。恰逢天津设卫筑城620周年之际,我十分高兴为《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单霁翔

五大道 民国广场地区更新改造

《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一书作序,希望借此书让更多的人了解天津、热爱天津。

我曾经到访过许多国家和城市,多次组织和参与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申报等相关工作,深知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天津,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城市,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强的伟大历程。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承载着天津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津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始

终走在全国前列。从五大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风貌建筑群,到古文化街的街巷和历史风貌;从一官历史文化街区的异国建筑风情,到海河两岸近代工业遗存的历史印记,天津以其独具魅力的建筑风格和氛围,吸引了无数研究人员和游客的目光。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彰显了天津的城市魅力,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遗产。

天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北方的重要港口和商贸集散地,天津在近代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洋务运动的兴

20世纪30年代三岔河口地区航拍



三岔河口地区1918年转弯取直前后对比



起,到北洋政府的成立;从近代工业的崛起,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天津见证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天津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浓厚的色彩和厚重的底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天津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京剧、相声、杨柳青年画等传统文化艺术,在天津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丰富了天津的文化内涵,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此天津设卫筑城62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新的历史时期越发彰显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同时,我也希望《天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专著能够成为广大读者了解天津、热爱天津、传承天津文化的重要窗口,为天津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添砖加瓦,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大家读书

狂飙的赛马

万鲁建

《狂飙年代:西洋赛马在中国》,张宁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近代以来,伴随着外侨的到来,西洋的各种体育运动也随之进入中国,并成为一股潮流。赛马便是其中之一。西洋赛马最初于1842年出现在厦门鼓浪屿,随后香港和上海也举行了赛马。此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不断开放,赛马活动陆续扩展至天津、牛庄、北京、汉口、青岛等埠,其中上海、天津、汉口是最重要的中心,尤以上海最具规模。因此,说到西洋赛马在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提上海。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张宁研究员,长期致力于赛马研究,2024年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狂飙年代:西洋赛马在中国》便是其最新的成果。作者依靠扎实的学术积累,为历史爱好者撰写了一本兼具学术和通俗的历史读物。该书主要介绍了英式赛马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观察中西文化汇聚下形成的冲击和影响。

本书共分六章。对于赛马如何从西洋传入中国并生根发芽,张宁在该书第一章进行了讲述。她认为英式赛马的传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由于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国家特许的贸易组织,在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外商居住在指定的区域,且不准在外过夜,亦不得携眷入住,使得商人在百无聊赖之际寻求打发时间的活动。而赛马则是英式社交的重要载体,于是外商“或举行赛马借以娱乐”。外国租界在华设立后,外国人便开始寻觅场地举行赛马活动。而且,各商埠的外国人社区主要以年轻男性为主,生活寂寞,“为了避世斗殴、酗酒、赌博,甚至沉迷当地女子之类的荒唐事”,租界当局也鼓励他们从事激烈运动,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赛马便是其一。此外,骑马在英国属于贵族运动,而来华外侨多系中产阶级下层,他们的社会地位因租界的殖民性质而得以提升,遂对更高阶层的的生活方式起了模仿之心。正是在这三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赛马运动逐渐在各租界兴起。要赛马就需要场地,上海的赛马场也经历了三次变迁,从最初的“老公园”,中经“新公园”,最后是南京西路的第三跑马场。赛马所使用的马也从最初的英国纯种马逐渐改为蒙古马,一方面是出于成本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英人和蒙古马来说,上海都是他乡,两者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随着赛马运动的兴起,赛马参加者日益增多,于是便成立了赛马俱乐部——上海跑马总会。正如其他外侨所成立的俱乐部一样,赛马俱乐部也是一个高度排外的组织,并不接受华人加入。即便是上海知名商人叶澄衷的儿子、具有外国留学经历的叶子衡,在当时上海赛马总会主席拉克的襄助下,两次申请入会也未能如愿。在这样的刺激下,叶子衡决定联合宁波帮商人自行筹建赛马场,成立赛马会。这便是江湾跑马场和万国体育会,它是中国人成立的第一个赛马场和俱乐部。万国体育会虽然由华人组建,但是洋人也参与其中,实际上是一个洋人与华人共同参与的组织,很多规定对华人马主来说不尽公平。例如,上海跑马总会不收华人会员,但万国体育会却华洋皆收,结果使得华人马主只能参加江湾赛事,而无法到公共租界赛马会为了彻底打破这种不公平,范回春联合青帮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在引翔港再次新建赛马场即“远东公共运动场”,并成立“中国赛马会”,以纯粹华商为号召,广纳华人马主和骑师参与。可以说,从上海跑马总会,到万国体育会,再到中国赛马会,既是上海赛马运动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华人不断争取赛马平等、重构上海赛马秩序的尝试。华人通过加入马会、获得圈内人的肯定与尊重,成为他们在租界获得地位的一种手段。而外侨与华人通过共同举办比赛或相互往来而逐渐打破华洋壁垒,使得租界社会空间和赛马俱乐部出现了出人意表的转变。

如果说赛马进入中国,最初只是一种公众娱乐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赌博方式。正如上海、天津的回力球场一样,跑马场也成为赌场。张宁在第四章就此展开了讨论。她从观众的视角出发,探究赛马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所造成的影响。英式赛马引入上海后,华人观众很快就聚而观之,犹如参加庙会一般。后来随着跑马场对外开放,市民便迅速由“看跑马”变成“买马票”,由此观众的观看习惯发生了变化,昔日跑来跑去看热闹的情形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站定一处、屏气凝神地注视,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马票纠纷。赛马已不再是纯粹的体育运动,而是成为赌博下注的一种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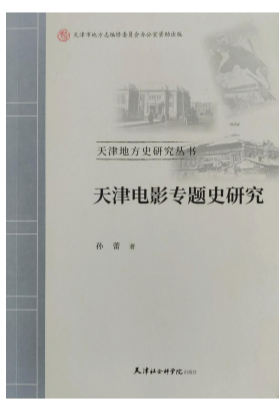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赛马运动也与女性解放有关。最初,赛马并不允许女性参加,她们只是扮演观众的角色,甚至成为马场外的一景。此后通过担任颁奖人和拉马走过大看台,再通过猎纸赛,逐步闯入这个属于男人的禁区。张宁在第五章通过希克林夫人、可子小姐、小立达尔夫人等人的事迹,来说明租界外侨女性逐渐从观众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过程,也揭示了女性地位的提。最后一章是跑马厅从赛马场变为人民广场的历史,宣告赛马在中国大陆的终结。

体育活动,看似只是一项运动,实则隐藏着政治含义。有学者指出,帝国的建立最初凭借的可能是政治与武力,帝国的维系却需要仰赖文化的输出。而“运动看似最为无害,其影响却最深远”。本书关于西洋赛马在中国的历史,恰是最好的注脚,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分享悦读

作为区域电影史的天津电影研究

杨楠



《天津电影专题史研究》,孙蕾著,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影的发端开始梳理天津百年电影史,力图从多维度呈现一个丰富的天津电影史,以新的视角与方法对天津地域电影发展史进行梳理和阐释,每个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近代天津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态,这一时期天津几乎没有制片业,但放映业却特别发达;另外,这一时期从天津走出去的影人特别多,可以说他们构筑了20世纪三四十年的中国电影史中重要的一部分。解放初期,天津电影制片厂与北影厂合作拍摄了《红旗谱》,历史原因天津电影创作转向了新闻片与纪录片。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天津电影制片厂的重构,天津在电影创作上又成为在全国都极为罕见的得奖专业户,无论是片种还是奖项,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重要奖项甚至国际大奖。

《天津电影专题史研究》共有六章,第一章梳理了天津早期的电影传播,挖掘民国报纸与天津电影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章梳理天津电影制片业的发展;第三章分析天津电影创作特征;第四章的研究对象是天津的电影院,特别是早期的地方影院,这对今天的院线发展具有启发性作用;第五章是关于天津电影群体的研究,除导演外还涉及编剧、演员、电影实业家

拍摄的风景短片《天津街景》。

1907年百代公司电影部经理周子云,创建了权仙电戏院(今淮海影院),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家影院。随后,天津的电影放映逐渐辐射到北京、陕西等地,天津成为中国电影传播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天津的电影业,从最初借助茶园、戏院、公园等传统娱乐场所进行放映,逐步发展到改造或新建独立的电影院,电影逐步成为天津一项独立的娱乐项目。天津电影的放映业,从“外洋灯影”发展到“电影”,天津即成为“电影”一词肇始地;天津电影艺术本身,也从纪录片到故事片,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这些都见证了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过程。

《天津电影专题史研究》一书以天津电影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传统的历时性结构,从电

好书推荐

《北洋法政学堂校史》,刘国有著,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在他构建的意义之网中,天津地方文化气质呼之欲出。

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书写历史,通常有宏观与微观两种历史观察视角。宏观的研究视角虽有助于把握“大历史”的发展趋势,但也会因为流于宏观而引发人们的质疑。同样,微观的研究视角虽然为宏大叙事提供了具体例证,让历史变得更加多样与独特,但过于对细节的追求也会引发一叶障目的批评。因此作为地方史研究者,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是走出“地方”的一个重要路径。在《校史》中,作者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在对法政学堂办学源流的溯源中,北洋法政学堂同近现代中国大多数学校一样,办学历史曲折且复杂,加之近代历史过于冗阔,因此大多数数学史资料会被宏大历史所淹没。作者一方面遍查报刊、书籍、档案以及回忆录等资料,厘清了该校复杂的历史办学源流,同时将之与近现代天津历史上诸多事件,如清末新政、辛亥滦州起义、国会请愿以及民初学制改革等事件相联系,并进行了讨论。从而让读者既了解到一些鲜活的历史细节,如李大钊曾有意担任校长、法商学院的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以及学生如何投身于社会活动等,也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丰富了对于近现代中国法律教育史和天津地方史的认识。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下,爬梳一个具体而微的校史,阐释以大学为载体的现代法学教育,能够以史为鉴,更好地自下而上去了解近代法学教育的现代化转型脉络,同时也是感受天津沧桑变迁历史逻辑的重要手段。

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历来重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以发挥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之功能。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资助出版的“天津地方史研究丛书”即是如此。该丛书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天津城市文脉精神、繁荣地方文化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地方史料价值。《北洋法政学堂校史》即为其中一部。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教授刘国有编著的《北洋法政学堂校史》(以下简称《校史》)由“法政学堂历史梳理”与“法商校史资料选”两部分组成,共计40余万字。该书历时10余年积累与打磨,法政学堂历史梳理、校史资料收集、章节设置以及遣词造句可谓用心。作为法商学院的第一本校史著作,作者不仅为现代法学教育和法制史研究领域提供了借鉴路径,而且为天津地方史研究贡献了智力支持。

天津是一座有着鲜明地方特质的城市,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塑造了这座城市底色。对天津“地方”有着直观且浓厚兴趣的当数天津土著,他们虽来自不同行业,但经由直观感受形成的天津文化矩阵,促使他们不但热心于发现,还热衷于宣传、保护与传承天津城市文化。作者为天津

于地方中发现历史

王静

知,展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的地方社会特征。

地方史志当“贵在史识,重在致用”。学术意义上的地方史研究常被比喻为解剖麻雀,解剖一只麻雀可以了解所有麻雀的生理结构,但每只麻雀又是独特的个体。说明“麻雀”是什么,才是解剖麻雀应该最终完成的任务。所以地方史不仅是特定人群生存的家园,也是“地方讲述自我特色故事”的原生地。作者将档案资料与口述历史结合,通过历史研究方法最终成书。这些文本内容既是对北洋法政学堂校史的概括与总结,更重要的是这些文本内容因其“地方性”易引起当地人的共鸣,而后通过当地人的阅读与传播,在与传统历史记忆的校正中形成了具有当下时代特色的历史记忆。而这恰恰契合了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增强地方认同、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

《校史》的面世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并关注北洋法政学堂的历史,对于近代转型中的天津也有了更深的学理认识,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投身于天津地方史的研究中。或许如作者所言,该书最大的憾事是资料收集未能尽善尽美,这也是地方史研究者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总之,瑕不掩瑜,相信更多天津地方史研究、天津法律史研究会出更多上乘的著作。